

高樓與商場： 可洛、陳志華、韓麗珠的 超密度城市空間書寫^{*}

鄒文律

提 要

自從西西《我城》(1975)出版以來,以香港城市空間為想象起點的作品漸次出現,當中不少出於“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之手。他們的創作風格多元,但自覺地以小說書寫 1997 年以後的香港城市空間,或從城市空間生發各種文學想象的取向,幾無二致。本文聚焦於三位“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可洛、陳志華、韓麗珠,以他們小說的城市空間想象為切入點,考察他們筆下的超密度城市空間。本文發掘小說呈現的香港城市空間特色——首先是資本塑造而成的超密度,其次是全面商場化的空間運用。通過闡釋“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構築的各種文字城市(“O 城”“幻城”“H 地”),本文繼而探討小說如何展現青年作家對香港的憂思,以及作家如何嘗試通過召喚想象力來重塑城市空間。

關鍵詞: 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 城市空間 香港小說 摩天大廈 商場

* 本論文為香港研究資助局(RGC)資助的教員發展計劃(FDS):“城市景貌之想象——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研究”(“Imagination of Cityscape: A Study on Post-1997 Hong Kong Young Writers”)(計劃編號:UGC/FDS25/H01/18)的研究成果之一。承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計劃副協調員趙曉彤女士及研究助理葉秋弦小姐提供重要協助,謹此銘謝。

一、引言：高樓與商場組裝而成的城市

1997 年以來，可洛（梁偉洛）、陳志華、韓麗珠等在香港成長，接受基礎和大學教育的“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¹ 憑著贏得港臺兩地的文學獎項，創辦文學雜誌，出版首本個人小說集等途徑，逐漸進入香港，以至兩岸三地的文壇視野。這批“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創作風格不一，但細讀他們的小說，不難發現他們就像前代作家劉以鬯（1918—2018）、西西（1938—）、也斯（1949—2013）、董啟章（1967—）那樣，對香港的城市空間有豐富而敏銳的觀察。他們延續了前代作家以香港為原型，² 通過文字創造虛構城市的傳統，一方面以超現實的筆觸發揮個人文學想象力，另一方面描劃了自從香港主權移交以來城市景貌的變遷。

“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筆耕不輟，但關於他們作品的研究和探討，不僅數量有限，也通常以個別作家或特定作品為主。³ 有論者提出“後九七香港青年

1 鄒文律認為這群作家擁有類近的成長經歷和教育背景——他們在香港接受基礎教育，並於在地大學完成本科/碩士學位課程，於 1997 年之後出版第一本個人小說集。他們長年在香港生活，童年或青少年時經歷了 1980、1990 年代香港經濟和城市急發展發展的時期，見證了資本如何不斷形塑香港的城市空間，屬於擁有相類城市生活經驗的“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見鄒文律：《論〈i-城志·我城 05〉的城市及身體空間書寫——兼論“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情感結構》，《人文中國學報》，第 25 期，2017 年，頁 214—216。

2 例如西西《浮城誌異》中的“浮城”，“肥土鎮系列”中的“肥土鎮”；董啟章“V 城系列”中的“V 城”。

3 例如以韓麗珠為研究對象的碩士論文有：鍾夢婷：《韓麗珠“家”的書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哲學碩士論文，2012 年）、溫煒瓚《香港作家韓麗珠小說研究》（臺灣：“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2015 年）。以韓麗珠、謝曉虹、李維怡三位女作家為研究對象的碩士論文：陳姿含：《九七後香港城市圖像——以韓麗珠、謝曉虹、李維怡小說為研究對象》（臺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2016 年）；以韓麗珠研究對象的學術期刊論文：梁淑雯：《無法“把身體放下”：香港女作家韓麗珠小說中的身體書寫》，《文藝爭鳴》，2 期，2018 年，頁 7—13、林怡伶：《轉變是希望的開始？——論韓麗珠〈風箏家族〉身體與空間的變異意涵》，《東華中國文學研究》，11 期，2012 年，頁 199—216；以可洛小說為研究對象的論文：鄒文律：《重塑“我城”——從西西〈我城〉到可洛〈鯨魚之城〉》，《東海中文學報》，36 期，2018 年，頁 36—68。陳智德《根著我城：戰後至 2000 年代的香港文學》（2019）則有一章專門討論潘國靈和謝曉虹續寫西西《我城》的《我城 05》，見陳智德《根著我城：戰後至 2000 年代的香港文學》，（臺灣：聯經出版公司，2019 年），頁 497—504。

作家”一說，試圖探問他們的“情感結構”。⁴ 論文指出，“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雖然生活在奉行資本主義的香港多年，但普遍察覺到資本在城市空間無止境擴張引發的摧毀性壓力。該論文把“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視為群體的研究角度確有啟發，但相關討論絕不應至此為止。事實上，隨著資本持續塑造香港地景，哪些城市空間成為“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反覆敘寫的對象？他們敘寫這些城市空間時展現了哪些共同感受？面對日趨單一化的城市空間，個人的想象力如何重新塑造城市，打開嶄新的可能性？本文將會聚焦於可洛（1979—）、⁵ 陳志華（1970—），⁶ 韓麗珠（1978—）這三位“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小說，⁷ 把他們通過文字創造的“O 城”“鯨魚之城”“幻城”“H 地”並置閱讀，回應上述的問題，進一步探問“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文學關懷。

陳志華在《O 城記》（2008）描繪了一座不斷通過填海和擴建來積累財富的

-
- 4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馬克斯主義與文學》（Marxism and Literature）論及，每一個時代的人皆有其獨特的社會經驗與社會關係，他們共同感受到的情緒與經驗，將會凝結在一代人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中，並可以通過該時代的文學作品找到踪跡。見 Williams R., *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pp.128–135.
 - 5 可洛（原名：梁偉洛，1979—），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曾任職編輯，現職為獨立創作人及寫作班導師。在 1998 年獲得第 24 屆青年文學獎戲劇初級組冠軍，作品名為《教育狂想曲》，這也是他第一篇發表的文學創作。第一本小說集《繪逃師》出版於 2005 年，獲得第九屆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推薦獎。其餘作品著有《鯨魚之城》（香港：日閱堂出版社，2009 年）、《女媧之門》（香港：明窗出版社，2007 年）系列、《她和他的盛夏》（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詩集《幻聽樹》（香港：廿九几，2005 年）等。
 - 6 陳志華（1970—），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電腦科學系，於 2007—2011 年擔任文學雜誌《字花》編輯。2012—2015 年擔任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長，現為理事。第一本小說集《失蹤的象》出版於 2008 年。編有《2012 香港電影回顧》（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13 年）、《香港電影 2018》（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19 年），合編有《花樣的年華：澤東廿五》（香港：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2016 年）、《十年再見：楊德昌》（香港：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2017 年）等。
 - 7 韓麗珠（1978—），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翻譯系，後於香港嶺南大學取得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碩士，現職自由寫作人、寫作班導師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兼任講師。韓麗珠在中學三年級開始投稿，最早的散文創作於 1992 年 12 月 24 日（《白色聖誕夜》）發表於關夢南主編的《星島日報·文藝氣象》上。不過，韓麗珠受文壇注意，還得等到她在 1998 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輸水管森林》（香港：普普叢書，1998 年）。著有《寧靜的獸》（香港：青文書屋，2004 年）、《風箏家族》（臺灣：聯合文學出版社，2008 年）、《縫身》（臺灣：聯合文學，2010 年）、《離心帶》（臺灣：印刻文學，2013 年）、《失去洞穴》（臺灣：印刻文學，2015 年）、《空臉》（臺灣：聯經出版公司，2017 年）等。

城市 O 城。⁸ “O” 意味著由零開始, 能夠把不同的東西填進去, 因而擁有無盡的可能。⁹ 那麼, 填進去的是甚麼呢? 小說回答: “我只知道 O 城仍在不斷填海, 不斷擴建, 堆起更多財富”。¹⁰ 無論是“填海”增加土地, 還是在土地上不斷“擴建”, 城市空間擴展的目的都是為了積累資本, 讓資本主義在香港得到持續發展。段義孚在《空間與地方》論及人類與空間的關係時指出, 在人類的不同感官中, 視覺對於人類的空間意識至為重要, 其他感官諸如聽覺和觸覺, 則擴大並豐富了視覺帶來的空間意識。¹¹ 既然視覺對於塑造人類的空間感受如此重要, 那麼陳志華塑造的文字城市呈現了怎樣的視覺印象?“我眼下的 O 城, 是個高樓密布的城市, 有數不清的購物商場”。¹² 對陳志華而言, 資本塑造的 O 城最終形成了一幅由“高樓”和“商場”組構而成的城市景貌。

O 城的城市空間映現了香港自 2000 年以後大行其道的空間發展模式——“高樓”和“商場”混合而成的城市規劃。香港近年可供發展的土地相當有限。香港特區政府在 2017 年 9 月成立了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小組發表的報告指出 1995 至 2005 年, 香港已發展土地的面積共增加了 6 000 公頃(60 平方公里), 在 2005 年至 2015 年卻大跌至 400 公頃(4 平方公里);¹³ 報告認為香港未來十年(2019—2028)若然要持續發展, 預計短缺 815 公頃土地(8.15 平方公里),¹⁴ 土地供應嚴重短缺。誠如黎東耀所言, 自 2000 年以來, 香港的市區大型發展計劃幾乎按照“垂直都市主義”(Vertical Urbanism)進行。這種規劃設計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類在新建鐵路站上蓋建築廣闊的基座(board podium)置放商場, 再在基座上興建商業/住宅大廈(例如香港站上蓋的國際金融中心); 第二類則

8 《O 城記》最早發表於《明報·世紀版》, D04, 2008 年 6 月 16 日。後收入陳志華短篇小說集《失蹤的象》。

9 陳志華:《O 城記》,《失蹤的象》(香港: Kubrick, 2008 年), 頁 84。

10 陳志華:《O 城記》,《失蹤的象》(香港: Kubrick, 2008 年), 頁 84。

11 Yi F. T.,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U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p.16

12 陳志華:《O 城記》,《失蹤的象》, 頁 75。

13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土供組報告》, 頁 31,《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網站, 2018 年 2 月 28 日, 網址: <https://www.landforhongkong.hk/tc/views/index.php> (2019 年 9 月 5 日上網)。

14 同上, 頁 14。

在面積較小的市區更新項目中建築高基座(tall podium)置放商場,再在基座上興建商業/住宅大廈。¹⁵ 香港政府長年倚賴賣地收益補貼公共財政開支,造成地價不菲。房地產發展商爲了增加利潤,不斷把建築物向高空延伸,盡可能增加可出售/出租的樓面面積。如此的發展模式造成香港擁有世界最多的摩天大廈,總數達 1 309 棟;每平方英里的商場密度亦屬世界最高。¹⁶

“高樓”和“商場”不獨是 O 城矚目的城市空間,也反覆出現在“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小說,寄寓了他們的空間感受。下文將會從兩方面開展討論:(a) 超密度城市與圍牆效應;以及(b) 商場之都。

二、超密度城市與圍牆效應

韓麗珠的小說向來備受香港和臺灣兩地關注。她的首本個人短篇小說集《輸水管森林》出版於 1998 年,同名小說《輸水管森林》(1996)在她 17 歲時寫成,旋即爲她贏得香港文學界的肯定。¹⁷ 有關《輸水管森林》的主題和寫作風格,現存已有不少討論,本文在此無意重複。¹⁸ 本文意欲指出的是,寫成於香港主權移交前一年的《輸水管森林》,其篇名可謂 1990 年代至今香港城市空間的絕佳隱喻。

“輸水管森林”以“輸水管”與“森林”兩個概念組合而成——前者是人工

15 Stefan Al, *Mall City — Hong Kong's Dreamworlds of Consump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p.53.

16 Stefan Al, *Mall City — Hong Kong's Dreamworlds of Consumption*, p.1.

17 收入許子東主編的《香港短篇小說選(1996—1997)》,得到許子東高度肯定。許子東認爲小說以一連串“殘雪式”(即具有中國當代作家殘雪風格)的細節(洗腸、偷窺、病房等)將外婆垂死一事,與城市的更新聯繫起來。當中腸子般的大廈輸水管成爲既令人讚歎又令人恐懼的都市風景。見許子東主編:《香港短篇小說選(1996—1997)》,(香港:三聯書店,2000年),頁5。後來,在2001年出版的“三城記小說系列”第一輯“香港卷”,主編許子東選用《輸水管森林》爲該卷冠名之作,顯見他提攜新銳青年作家的用心。

18 事實上,《輸水管森林》以“外婆壞了的腸子和城市舊大廈的輸水管互爲隱喻”,以及“殘雪式”的寫作風格,一直爲其他評論者津津樂道,堪稱當代香港文學的經典之作。見黎海華:《陌生的異域——閱讀韓麗珠》,《城市文藝》,63期,2013年,頁82。劉紹銘:《香港文學無愛紀》,《信報財經新聞》第24版,2004年6月19日。

建設,乃至整體城市營造環境(Built Environment)不可或缺的設施;¹⁹後者則是衆多樹木組成的自然環境,爲大自然的動植物提供棲息地。香港缺乏土地资源,山多平地少,城市景觀的主要特色便是市區連綿密植的樹狀塔樓,塔樓全部都像森林那些爲了贏得陽光的樹木那樣極力向天空延伸。不論是哪種戶型的住宅大廈,一般不低於30層。²⁰矗立於維多利亞港兩岸的,有兩棵“參天巨樹”(兩幢四五百米高的塔樓)——屹立於中環香港站的國際金融中心二期(88層,落成於2003年)和油麻地九龍站的環球貿易廣場(118層,落成於2011年)。薛求理認爲,這兩棟高樓把香港維多利亞港的景色從西往東鎖定。從九龍半島的尖沙嘴帶透視仰角望去,國際金融中心二期在視覺上還要比香港島的太平山(高554米)高出一倍。²¹兩棵“參天巨樹”之間的高樓錯落有致地構成一座“森林”。另,“輸水管”內部中空,容許水流動其中的通道意態,反映了香港容許全球資本任意匯聚流通的空間特色。如果視“水”爲資本流通的象徵;²²那麼“輸水管”便是資本流通的管道。香港擁有連結全球的股票和房地產市場,全球資本可以毫無障礙地自由進出,在“輸水管森林”內不斷流通和積累,按其需要塑造和更新城市空間,猶如大自然的水於樹幹內流動不息,爲資本主義“輸水管森林”的持續發展/生長提供動力。

全球資本持續塑造香港地景,最終令香港的城市空間承受“雙重壓縮”,一方面是全球化壓縮:空間被逼服從於全球化資本積累的目的,以增加剩餘價值;另一方面則是地方性壓縮,全球化壓力導致不斷惡化的人口及城市住房密度問題,空間被逼適應有增無減的城市密度。²³雙重壓縮最終造成超密度

19 從屋宇設備工程的角度來看,水、電、空調三大系統乃現代建築物不可或缺的設備。輸水管(不論輸送食水還是污水)暢通無阻,是現代建築物提供宜居環境的前提。

20 張爲平:《隱形邏輯:香港式建築極限》(香港: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76。

21 薛求理:《城境——香港建築1946—2011》(香港: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248。

22 粵語時常把“水”喻爲“資金”。例如“薪金”在粵語中稱爲“薪水”。在股票交易市場,不時把來自中國大陸的資金,視爲“北水”。大衛·哈維取鏡自大自然,以“水的循環運動”做比喻以描述資本運作的方式。詳見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資本思維的瘋狂矛盾》(臺灣:聯經出版公司,2018年),頁28—31。

23 黃宗儀:《上海酒吧:空間、消費與想象》(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206。

(hyper density)的城市空間現象。²⁴ 香港的市區人口密度大概為每平方公里 2.7 萬人,比紐約、東京等全球化城市至少高出 5 倍。²⁵

在《O 城記》裏,超密度催生了在“堆填谷”的極限城市景觀——“屏風樓”:

偶然還會出現屏風一樣的樓盤,像圍牆一般擋在前面。居民為了擁有一個狹小的空間,都得付出高昂的價錢。房子跟房子擠在一起,打開窗子,就可以跟鄰居握手了。²⁶

“堆填谷”的土地由填海得來,除了大量住宅,附近還有垃圾堆填區。²⁷ 熟識香港地理的讀者不難發現“堆填谷”指涉現實香港的將軍澳。²⁸ “堆填谷”內高樓之間距離極少(“打開窗子,就可以跟鄰居握手了”),其密集式排列方式更造成“屏風一樣”的城市景觀,即所謂“屏風樓”。²⁹ 屏風樓在地少人多的香港並非新事物,但它在 1997 年以後大規模出現,成為香港隨處可見的城市景觀。³⁰ 屏

24 張為平:《隱形邏輯:香港式建築極限》,頁 III。

25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土供組報告》,頁 10,《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網站,2018 年 2 月 28 日,網址: <https://www.landforhongkong.hk/tc/views/index.php> (2019 年 9 月 5 日上網)。

26 陳志華:《O 城記》,《失蹤的象》,頁 83。

27 同上,頁 84。

28 香港新界西南部的將軍澳在 1980 年代中期開始發展新市鎮,同時亦成為香港主要的垃圾堆填區。

29 “屏風樓”在學術界未有明確定義。香港民間團體“環保觸覺”聯同建築師及規劃師,設定了 6 個屏風樓宇指標。如果滿足其中 3 個或以上,便有很大機會屬“屏風樓”。這 6 個指標分別為:(1) 屋苑內座與座之間沒有足夠距離(少於 15 米);(2) 屋苑各樓宇的平均高度(包括平台)超過 35 層;(3) 屋苑內的樓宇布局是接近“一”字排開;(4) 樓宇的位置是具影響性(例:海邊、市中心、通風廊);(5) 屋苑或樓宇的較闊一面是迎向盛行風;(6) 附近有比較低矮的樓宇。見環保觸覺:《圍城:從屏風樓看香港的城市規劃》(香港:Warrior Book,2009 年),頁 99。

30 “屏風樓”之所以在 1997 年之後大量出現,與以下三個因素有密切關係:(一)自從赤鱗角香港國際機場在 1998 年投入運作,原先為了保障航道安全而設的全港建築物高度限制在同年終止,維多利亞港兩岸的新建大廈有更多空間向高空延伸。(二)特區政府為了增加住宅供應,提高地盤地積比率(plot ratio),比率越高,可興建的樓宇面積越高。(三)新建鐵路站上蓋的建築地盤受鐵路站設計影響,一般呈長方形。前述三種因素共同作用下,房地產發展商為了令住宅單位獲得良好景觀、通風和寧靜的居住環境,以便賣得更好的價格,四十至六十層的住宅往往採取連城式建築群佈局,形成“屏風樓”。

風樓加劇了城市空間的密度,造成圍牆效應(wall effect),對社區的通風、³¹採光及景觀造成負面影響。然而,屏風樓除了影響空氣流通和污染物消散,更造成城市居民心理上的圍牆效應。在可洛和韓麗珠小說的小說裏,屏風樓更被當作超密度城市空間的專屬符號。

《幻城》(2018)由六篇情節既相關亦獨立的故事組成,講述一座建造於巨大鯨魚背上的高塔城市——幻城上發生的事。³²讀者不難發現這座“鯨魚背上的城市”乃可洛前作《鯨魚之城》(2009)的延伸和變體,³³亦可以視為可洛對香港當下的觀感,以及未來的預想。《鯨魚之城》續寫了西西《我城》,描繪了一條鯨魚誤闖“我城”水域的故事,展現了可洛對“我城”受發展主義支配的憂思。到了《幻城》,鯨魚和高塔連成一體,創造出獨特的“我城”形象。小說在目錄頁的前一頁寫道:

傳說幻城建立在一條巨大無比的鯨魚的背脊上,為了提防鯨魚潛入海中淹沒城市,幻城人把建築物愈蓋愈高,層層相疊,城頂通天。³⁴

為了不讓城市被海水淹沒,幻城不可能水平擴展,只能垂直發展,最終演變成擁有180樓層的高塔城市。幻城的視覺形象無疑讓人想起香港的超高層摩天大廈,而可洛把這種視覺形象以想象力推至極限——幻城本身就是一座通天高樓,內部的每一樓層都是獨立的大型城區,擁有包括屏風樓在內的各種人工建築。

在O城只是偶然出現的屏風樓,於幻城已經隨處可見。《怕醜草》的施天雅

31 S. H. L. Yim, J. C. H. Fung, A. K. H. Lau, S. C. Ko., “Air ventilation impacts of the ‘wall effect’ resulting from the alignment of high-rise buildings,” *Atmosphere environment*, 43 (Dec.2009), p.4993,沿海岸線以連城佈居排列的高層大廈將會造成“圍牆效應”,為城市的通風及空氣污染帶來明顯的負面影響。

32 《幻城》由六篇小說組成,分別是《阿果的線上和線下生活》、《想死》、《怕醜草》、《守城人》、《幻城》、《幻城的四季》。

33 關於《鯨魚之城》的分析,請見鄒文律:《重塑“我城”——從西西〈我城〉到可洛〈鯨魚之城〉》,《東海中文學報》,36期,2018年,頁31—68。

34 可洛:《幻城》,目錄頁的前一頁(香港:立夏文創,2019年)。

在音樂會結束後，拿著啤酒瓶在 80 層區的街上一抬頭，立時“看見一望無際的屏風樓”。³⁵ 即使在市中心外圍，摩天大廈略見疏落，“但它們還是像屏風一樣，遮擋著遠處的風景。”³⁶ 大部分幻城人居住的房屋面積都很小，窗外的風景就是隔壁摩天大廈的外牆。³⁷ 不單如此，幻城更是一個沒有天空的城市，每個人的頭頂上都是上一層的地基而已。³⁸ 狹小的房屋、處處可見的屏風樓、密封樓層……高樓構成了一層又一層的圍牆，把幻城人圍困其中，造成他們心理上的巨大壓迫感。³⁹

“大概每個幻城人一生之中，總有過輕生的念頭”。⁴⁰ 當壓迫感超越幻城人可以接受的限度時，他們便選擇自殺。自殺是《想死》聚焦處理的主題。《想死》通過一對夫婦（在醫院婦產科任職護士的妻子和在防止自殺署工作的丈夫）的生活，探討了幻城的城市空間如何造成日益嚴重的跳樓自殺問題。幻城有“一望無際的高樓大廈、不斷攀升和下降的巨型升降機、看不見盡頭的高架道路”，⁴¹ 讓人隨便在這些地方一躍而下便會粉身碎骨。為了應對危機，政府成立了防止自殺署，調查幻城人自殺的原因，並向政府提交防範建議。⁴² 為了防止幻城人跳樓，政府後來把全城建築物的窗子改裝成不能打開的梗窗（固定窗），玻璃堅固而難以被打破；在沒有窗子的高處則加裝高度達兩米以上的鐵絲網或圍欄——結果，密封式高樓成為安全的籠子/監獄，窗外的風景都被鐵絲網或圍欄擋住。⁴³ 《想死》裏的妻子由醫院回到居所時，總感到自己別無選擇地回到一座監獄，以致她覺得所有活在幻城的人，都在壓迫感折騰下經歷一場緩慢的集體自殺。⁴⁴

除了改造城市空間防範自殺，政府還根據防止自殺署的建議禁止電視台

35 可洛：《怕醜草》，《幻城》，頁 105。

36 可洛：《守城人》，《幻城》，頁 143。

37 同上，頁 160。

38 可洛：《幻城》，《幻城》，頁 240。

39 可洛：《想死》，《幻城》，頁 64。

40 可洛：《幻城的四季》，《幻城》，頁 258。

41 可洛：《想死》，《幻城》，頁 61。

42 同上，頁 44。

43 同上，頁 62—63。

44 同上，頁 64。

和製作公司製作含有自殺劇情情節的電視劇,以免幻城人模仿劇中的自殺方式。⁴⁵ 雖然政府不斷設下限制來保障幻城人的生命安全,幻城人還是繼續想方設法尋死。尋死對幻城人為什麼有這樣巨大的吸引力? 可洛通過一個自殺未遂的個案告訴讀者答案。

一位患有慢性病,失去丈夫和女兒的 45 歲女人打算把自己埋在垃圾堆裏自殺,最終獲救。獲救後,她被關在四周都包上軟膠和軟墊的病房內接受專門治療。可是,四個月的治療依然無法打消她自殺的念頭。⁴⁶ 她渴望尋死,並不因為身世可憐,而是自覺無法在這個限制越來越多,連自殺的自由都被剝奪的城市生活下去。她反問一直勸告自己珍惜生命的調查員:“活著就不苦嗎? 在這個城市裏,死法可以有多種,但活法只有一種,哪個更苦?”⁴⁷ 充滿壓迫感的城市空間,以及各種規限個體自由的保障生命安全措施,令幻城人的生活方式變得越來越單一。感到生活方式別無選擇的還包括身為護士的妻子。妻子在醫院婦產科工作,理應時常感受到生之喜悅,理應對生命倍加愛惜,但過著平靜生活的她卻時常感到不自由;直至她在丈夫口中聽見多種多樣的自殺方式時,突然感到死亡原來才是在幻城體現自由的惟一方式。⁴⁸

讀者不難看出,垂直擴展的幻城影射了垂直都市主義盛行的香港。幻城處處可見屏風樓,高樓的窗子無法打開,建築物四周有過多的鐵絲網和圍欄——圍牆效應不單帶來磨蝕人心的壓迫感,把幻城人推往慢性自殺的路上,更嚴重的影響是,它消解了幻城人在生活方面的想象力,就像妻子縱然想過辭去護士的工作,但小說從未透露她想象過自己可以從事其他職業,或者在辭工以後追求別樣的理想/發展,她只能順從眼前令她無從抗拒而又感到痛苦的安排。她厭惡沒有選擇的生活,卻又不知道自己可以選擇什麼;情況就像渴望擺脫鳥籠的鳥,其實並不認識鳥籠以外的世界。要不是丈夫告訴她幻城人有各種各樣的自殺方式,她也不會想到原來在自殺的方式上,她是可以自由想象和

45 可洛:《想死》,《幻城》,頁 45。

46 同上,頁 50—53。

47 同上,頁 52。

48 同上,頁 58。

選擇的。

單一的城市空間塑造出單一的生活方式。幻城如是，香港亦如是。進入 21 世紀，香港自從經歷亞洲金融風暴後決意走上一條金融主導的道路，金融和地產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城市空間以便利資本積累為主要方向來進行擴展和更新，⁴⁹最終發展出屏風樓處處可見的超密度城市空間。不少人活在其中縱然感到受困，渴望改變，卻也無法想象出其他具體可行的生活方式。超密度的城市空間正在不知不覺中囿限了人對生活方式的想象力。

超密度的城市空間同樣反覆在韓麗珠近年的小說中出現。《離心帶》(2013)寫街道上的人抬頭“發現天空被高聳的建築物切割成細碎小塊時，並不會感到驚訝”。⁵⁰舉目盡是高樓的描寫也出現在《清洗》(2015)：“有人抬頭，發現參差不齊的大廈把他們圍困在中央”。⁵¹《假窗》(2015)裏的“H 地”高樓林立，⁵²“大廈密密麻麻地矗立在四周，那些設計相仿的建築物，組成了無法跨越的高牆，把匆忙趕路的人圍困在其中。”⁵³至於城市邊陲的新發展區，超密度的城市空間不單絲毫沒有改善，還更為嚴重：“在那裏，大廈和大廈之間的距離更窄小，住宅也更稠密，建築物像迷宮那樣把人們圍困”。⁵⁴與窗子尚存的幻城不同，“H 地”最新的建築趨勢是無窗。“H 地”的高樓與高樓之間的距離非常窄小，窗子不再能夠引入新鮮空氣和陽光，只能帶來空調產生的廢氣和街道上嘈雜的人聲和車聲，加上“從一扇敞開的窗子掉到街上去的獨居者，數目愈來愈多”，為了讓人心神平靜，小說內的房屋仲介向正在找房子租住的微說：“無窗是一種必然的趨勢。”⁵⁵

生活在密封高樓裏的人有甚麼感覺？微搬進去後，感到“自己的生命正在

49 余嘉明和李劍明：《經濟金融化與香港經濟》，載於羅金義和鄭宇碩編：《留給梁振英的棋局：通析曾蔭權時代》，頁 81—82。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3 年。

50 韓麗珠：《渡海》，《離心帶》（臺灣：印刻文學，2013 年），頁 5。

51 韓麗珠：《清洗》，《失去洞穴》（臺灣：印刻文學，2015 年），頁 185。

52 《假窗》在 2014 年最初發表於《香港文學》第 349 期，後來在大幅度擴寫後收入《失去洞穴》(2015)。

53 韓麗珠：《假窗》，《失去洞穴》，頁 132。

54 同上，頁 133。

55 同上，頁 134。

房子裏緩慢地凍結起來,她像個旁觀者一籌莫展,但一點也不難過”。⁵⁶ 在密封的高樓裏生活,人就像處於冬眠狀態的動物,呼吸猶在,卻再無感受生活的力量。

事實上,受困於超密度城市空間的人並非不渴望得到自由。微在乘坐房屋仲介的車子時,把目光投放在那片被高樓切割得七零八落的天空,“只有那裏是清淨的虛隙,讓她到得喘息的機會。”⁵⁷ 事實上,無論在可洛還是韓麗珠筆下,予人無限空間感的天空都象徵可供實現自由的所在。誠如段義孚在分析空間和個人感受之間的聯繫時指出,寬敞的空間容易令人聯想起自由,自由意味寬敞,意味人有力量和足夠的空間來行動。實現自由(*being freedom*)的基本意思就是擁有超越現狀的能力。⁵⁸ 對可洛和韓麗珠來說,急欲超越的現狀便是擺脫眼前超密度的城市空間,以及附載其中的單一生活方式。

《失去洞穴》(2015)對於生活在超密度城市空間裏的人,如何渴望獲得寬敞的空間來實現自由,有進一步的描繪:

他(按:河流)想要把目光放在遙遠的前方,某個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曠所在,可是大廈之外是更高聳的大廈,以及巨型的屏幕。他抬頭往上方尋找可以給他任何慰藉的雲,但那裏只有一個七零八落的天空。⁵⁹

河流不能忍受繼續在超密度城市空間裏生活,他期望前往更為空曠的地方尋求自由。然而,一層又一層林立的大廈仿佛巨形牆壁那樣擋住河流的去路和視線。河流即使抬頭望天,渴望天上的浮雲能予他心靈慰藉,但他只能夠看見被高樓和屏幕剪裁得七零八落的天空。如果無際的天空象徵了完整的自由,那麼超密度的城市空間便把這種自由切割得“七零八落”——在河流居住的城

56 韓麗珠:《假窗》,《失去洞穴》,頁134。

57 同上,頁133。

58 Yi F. T.,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U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p.52.

59 韓麗珠:《失去洞穴》,《失去洞穴》,頁64。

市有著過多的規定，例如要在扶手電梯上站在左方、成人必須看顧攜同的小孩、走路的時候雙手切勿左右搖擺、咀嚼的時候不可同時講話等。這些規定能夠保障超密度城市空間內的秩序，卻令河流感到窒息。河流急欲擺脫眼前的超密度城市空間，以及其中由各種規條交織而成的生活方式，於是隨意乘上一輛可以把窗子打開的公共汽車，最終到達了一條瀕臨清拆的鄉村。⁶⁰

韓麗珠的小說時常展現對自由的渴望，例如《縫身》（2010）裏的“我”寧願以死來結束生命，也要重拾個體自由，把跟“他”縫合的身體切割分開。⁶¹《離心帶》（2013）的阿鳥患上“飄蕩症”，渴望能夠把自己放飛到半空，在那片象徵生命另類可能的自由空間“建造一個新的世界。”⁶²在《失去洞穴》裏，韓麗珠繼續把寬敞和自由相連繫，著墨之處則是仰望遼闊天空的鄉村。超密度的城市空間不僅在物理上嚴重局限身體的活動，凡事服膺於資本積累的都市邏輯更囿限了人在心靈上的自由。在備受資本形塑，地景和生活方式都越來越單一的城市，河流出走至鄉村的舉動無疑是追求自由和生命另類可能的表現。遺憾的是，鄉村最終因為城市擴張而被清拆，河流被逼重返城市，住進一個必須丟棄大量物件，才能把自己和極少量日用品擠進去的小套房。⁶³ 河流被迫重新回到超密度的城市空間，一切追求自由的行動皆為徒勞。

雖然可洛和韓麗珠筆下不乏渴求自由，尋求圍牆以外的天空的人物，但他們同時敏銳地察覺到，圍牆效應雖然予人壓迫感，但亦能夠為人帶來實實在在的安全感。《想死》裏的丈夫非常需要安全感，⁶⁴他因為工作所需，不單有份制定“幻城”的各種圍欄和建築物的設計標準，還為家居安裝了軟牆、防撞墊等各種保障家居安全的設備；⁶⁵對他來說，惟有一切風險都在控制之內，一切都井井有條，他才感到安全。圍牆效應為妻子帶來的壓迫感，對他來說便是安全感。

60 韓麗珠：《失去洞穴》，《失去洞穴》，頁 65。

61 韓麗珠：《縫身》（臺灣：聯合文學，2010 年），頁 223。

62 韓麗珠：《離心帶》，頁 253。

63 韓麗珠：《失去洞穴》，《失去洞穴》，頁 96。

64 可洛：《想死》，《幻城》，頁 49。

65 同上》，頁 69。

如此見解同樣迴響在《離心帶》之內。阿鳥如此評價城市裏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人，終其一生，都在建築一座安全的牢獄，把自己囚禁，而無法具備，活在囚牢之外的勇氣。”⁶⁶對阿鳥來說是“牢獄”的城市，對城市裏大部分人而言卻是一座安全的堡壘。當他們需要活動空間的時候，便可以前往那個舒心的地方——商場。

三、商場之都

陳志華在《O城記》描述O城時，除了提及它是“高樓密佈的城市”外，還“有數不清的購物商場。”⁶⁷可洛在《鯨魚之城》亦記述政府打算在2020年把全城發展成一個“前所未有的超巨大商場”。⁶⁸在一個土地面積增長速率遠不及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城市，當資本致力產生對其自身的再生產，便會塑造出有利其積累的地理景觀，⁶⁹資本在香港創造的顯著地景便是林立各區的購物商場。⁷⁰

購物商場除了服務在地市民，還為訪港旅客提供購物去處。香港主權移交以後，訪港旅客總數反覆上升，旅遊業被視為香港四大支柱產業之一。⁷¹1997年訪港旅客總數為1 040萬，中國大陸旅客佔整體訪港旅客22%，⁷²2018年訪港旅客總數達到6 514萬，⁷³中國大陸旅客佔整體訪港旅客78%。⁷⁴港澳

66 韓麗珠：《離心帶》，頁97。

67 陳志華：《O城記》，《失蹤的象》，頁75。

68 可洛：《鯨魚之城》（香港：日閱堂出版社，2009年），頁52。

69 大衛·哈維：《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臺灣：聯經出版公司，2016年），頁160。

70 朱耀偉：《本土神話：全球化年代的論述生產》（臺灣：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頁99。

71 旅遊業向來被視為香港四大支柱行業之一。詳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勞工處：《香港主要行業》，《就業資訊網上平台》網站，2017年，網址：<https://www.hee.gov.hk/heeip/tc/keyindustries>（2019年9月6日上網）。

72 香港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月刊》，（2000年1月），頁FD4。

73 香港旅遊業統計資料：《2018年旅遊業表現》，《香港旅遊事務署》網站，2019年8月20日，網址：https://www.tourism.gov.hk/tc_chi/statistics/statistics_perform.html（2019年9月6日上網）。

74 入境事務處：《2018年12月訪港旅客統計》，《HKTB Research》網站，2019年1月，網址：https://partnernet.hktb.com/filemanager/intranet/pm/VisitorArrivalStatistics/ViS_Stat_C/ViS_C_2018/Tourism%20Statistics%2012%202018_R1.pdf（2019年9月6日上網）。

個人遊計劃(自由行)自 2003 年推行以來,中國大陸遊客來訪香港的人數不斷上升(至 2018 年),導致購物商場空間在香港的需求一直有增無減。

呂大樂認為香港“商場化”時代的序幕始於 1966 年香港九龍尖沙咀的海運大廈開幕之時(當時香港最大型的購物中心),標誌了香港社會發展以及消費文化進入新階段。⁷⁵ 朱耀偉亦提及香港在發展新市鎮時,往往先興建一個市中心廣場(大型購物和娛樂商場),其他建設再圍繞這個“中心”向外擴散。⁷⁶ 香港房地產發展商投入大量資本建設能夠吸引消費者的地標式大型購物商場。1997 年以後,香港的大型購物商場不時置放於高基座或多層高樓之內。舉例來說,2004 年在旺角建成的朗豪坊,樓高 12 層;2007 年於九龍灣開幕的 MegaBox,高達 19 層;2012 年落成的銅鑼灣希慎廣場,則樓高達 17 層。誠如巴瑞·謝爾頓(Barrie Shelton)所言,香港的發展壓力相當實在,而政府在城市發展上擁有強大的力量,令城市傾向以垂直方式來擴充自身容量,並發展成為“商場之都”(Mall City),一點不讓人意外。⁷⁷

在超密度城市的街道上遊走,物理和心理上的圍牆效應都讓人感到不適。再者,香港天氣潮濕,炎熱多雨。無論外地遊客還是在地居民,大都喜歡遊逛設有空調的大型購物商場。大型購物商場幾乎都位於鐵路站附近,交通極為便利;一週中的任何日子都能在大型購物商場看見川流不息的人群。

呂大樂回顧香港尖沙咀海運大廈的歷史時指出,當年大型商場的人工化空間不單為香港年輕人提供了舒心開揚的氣氛,店鋪售賣的各式外國商品更成為連接世界的窗口。⁷⁸ 西西《我城》在描述大型商場“海港大廈”(對應現實中的“海運大廈”)時,也刻意提及它的大堂具備藝術空間的功能:“樓下的大堂,又喜歡展覽花道,擺些和古典吵嘴的桌椅,以及汽車。有時,還偶然舉行一次大家聽音樂會。”⁷⁹ 大型商場為“我城”人提供了工餘時間享受藝術,尋找日常生活以外另類可能的空間。然而,伴隨大型購物商場在各區交通樞紐位置

75 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2012年),頁111—112。

76 朱耀偉:《本土神話:全球化年代的論述生產》,(臺灣: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頁92。

77 Stefan Al, *Mall City — Hong Kong's Dreamworlds Of Consumption*, p.32.

78 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頁112—118。

79 西西:《我城》(臺灣:洪範書店,1999年),頁17。

陸續建成,商場在“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筆下已經不再是日常生活以外的另類空間,而是日常生活本身,甚或城市空間的主要呈現模式。

陳志華在《O 城記》寫道:“要講述 O 城的故事,不能不提浪豪角這個地方”,⁸⁰因為“很多人都說,它根本就是 O 城的縮影。”⁸¹小說裏的“浪豪角”本來名叫“爛頭角”,因為當地地形好像伸到海裏的破牛角。O 城人認為“爛頭角”的名字不好聽,故此在“浪豪商場”(對應現實中旺角的“朗豪坊”)落成後,該地便易名為“浪豪角”。地名的主要功能在於標示方向和位置,對於一國一地的經濟、行政皆有功能上的意義。地名亦反映了人與空間之間的關係,甚至可以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導入的重要符號,故此地名的轉變除了標示社會方向的重大轉變,亦透露了這種改變的作用的本質。⁸² 如果“爛頭角”一名想要突顯的是空間在地理位置和方位上的特點,那麼易名為“浪豪角”則意味著想要突顯該空間的主導性功能——商場。

如果《O 城記》描寫的 O 城在商場以外還剩下作為市民居住空間的高樓,那麼《木偶之家》便把城市空間商場化的想象推向極致。羅拉是生活在 4826 號商場(可見商場在當地數量極多)的木偶,她醒來以後希望“看看這個世界”,⁸³到處尋找離開商場,前往外面世界的方法。羅拉試過問途人商場的出口在哪裏,但無人能夠給她正確的答案,就連“商場指南”也沒有標示商場的出口。⁸⁴ 後來,她遇上一位穿著黑色娃娃服的少女,引發以下對話:

少女問羅拉:“你呆呆的站在這裏幹甚麼?”羅拉說她想尋找商場的出口,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少女追問:“甚麼是外面的世界?”羅拉解釋:

⁸⁰ 陳志華:《O 城記》,《失蹤的象》,頁 76。

⁸¹ 同上。

⁸² 葉韻翠對地名研究及晚近的批判地名學做了相當詳盡的介紹,詳見葉韻翠:《批判地名學—國家與地方、族群的對話》,《地理學報》,68 期,2013 年,頁 73—75。

⁸³ 陳志華:《木偶之家》,《失蹤的象》,頁 110。陳志華《木偶之家》首次發表於《字花》,第 9 期,2007 年 9 月。

⁸⁴ 同上,頁 114—115。

“就是商場以外的世界。”可是少女說：“商場外面還是另一個商場啊。”羅拉問：“那麼在這個商場和那個商場以外呢？”少女回答：“都是商場啦。只是編號不一樣而已。”羅拉愈聽愈糊塗了，說：“總有不是商場的地方吧。”少女就從口袋裏掏出一本紅色小書，翻開頭一頁，指給她看：“太初有商場/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Mall”。⁸⁵

商場以外再無世界，商場便是世界本身。“太初有商場”——對於少女和羅拉來說，她們自出生開始便活在商場之中，以後也會繼續活在商場之內。直到小說結束，不論羅拉怎樣努力，她依然無法離開迷宮般的商場。商場取代了住宅、公園、街區、社區中心，成為城市人生存和活動的惟一空間。這種資本把世界/城市空間徹底“商場化”的想象亦可見於可洛《鯨魚之城》。《鯨魚之城》在描述政府的“全城商場化發展藍圖”時便提到，除了傳統的移山填海，政府還打算把那些在資本積累效果上遠遠不及購物商場，像是公園、泳池、大學等建築物全部拆除。⁸⁶整座城市變成商場將會是資本主義創造出來的終極地景。饒有意味的是，政府興建超巨大商場的原因並非僅是為了配合資本積累，也是為了滿足市民需求。可洛告訴我們：“像阿安喜歡逛商場的人實在太多，不單是老年人，連年輕人都喜歡躲在商場裏”。⁸⁷《木偶之家》的少女道出了城市人喜歡逛商場的原因：“商場氣候宜人，有空調，又怕風吹雨打。我們可以在這裏出生，然後在這裏老死，多好啊。”假若少女因為自有意識起便活在商場，於是從未想象過離開商場的話；那麼阿安則是自願選擇生活在商場之內。阿安和情人阿果的約會全部都在商場內進行，而阿安也十分享受在商場裏遊逛和消費。有一次，阿果邀約阿安在商場以外的地方約會，阿安斷言拒絕：“你知道，我只能夠逛商場，要去你自己去。”⁸⁸除了逛商場，阿安哪裏都不能去。“阿安喜歡在晶瑩的櫥窗前，像魚兒一樣游來游去。”⁸⁹正如魚缸裏的魚不能離開魚缸而活，阿安

85 陳志華：《木偶之家》，《失蹤的象》，頁 118。

86 可洛：《鯨魚之城》，頁 52。

87 同上。

88 同上，頁 55。

89 同上，頁 53。

不能也不願意離開商場而活。

商場在香港的數量如此之多,自然構成了“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城市生活經驗裏的重要部分。可洛在〈咖啡杯裏的商場〉(2006)寫道:“直到現在,我還沒分清楚,是我們的青春沉積成商場的生命,還是商場的生命沉積成我們的歲月和回憶……”⁹⁰商場確實構成了“我”/香港人青春年月裏不可或缺的記憶。《咖啡杯裏的商場》是一本空想的商場圖鑑,當中描繪了好些虛構的商場,例如“捕捉眼睛的商場”、“連鎖設計的商場”等。可洛藉此探問現代商場如何以各種視覺元素和空間設計(例如商店的排列方式),勾起消費者購物的慾望並加以滿足。毫無疑問,商場是一個經過設計的受控空間,無論是燈光、溫度和濕度,以致景觀都經過人爲設計,務求延長消費者逗留其中的時間,提高他們的購買意欲。商場要促進商品的出售,必須刺激消費者的慾望來購買奢侈品(消費者當然也購買維持勞動力所必須的消費品),始能促進資本積累。

“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從來不否定商場空間的吸引力——商場排除了戶外氣候的不穩定性,又提供了清涼舒適的遊逛和消費空間。可洛在《幻城》點出商場空間消解煩擾的療效:“商場裏十分清涼,仿佛所有煩惱都被冷藏,不再活躍和滋生。”⁹¹如果生活在超密度的城市空間讓人感到窒息和絕望,那麼密封的商場則予人難得的自由——即使這種自由非常短暫,而且需要通過消費來獲取。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提及,“每去一次市場,消費者都理直氣壯地覺得是他們——也許甚至只是他們自己——在作主。”⁹²前述《木偶之家》中,穿著黑色娃娃服的少女便沉醉在商場裏買和賣的自由中,⁹³感到非常快樂。韓麗珠在散文《包裹》述及自己趁商場減價時購買衣服的經驗,亦證明鮑曼所言不虛:

在我居住的城市裏,大部份的人,即使窮盡畢生的積蓄,也無法購買一

90 可洛:《咖啡杯裏的商場》,《她和他的盛夏》(香港:匯智出版社,2006年),頁150。

91 可洛:《幻城的四季》,《幻城》,頁264。

92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全球化:人類的後果》(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81。

93 陳志華:《木偶之家》,《失蹤的象》,頁118—119。

幢房子，甚至，難以租住一個寬敞的居所。因此，除了挑選衣服，我們別無出路。如果無法把自己安置在理想的屋子，起碼，可以把身體放進華美的衣服裏。⁹⁴

逛商場購買漂亮的衣服成為無法在香港購買安身之所，覓得寬敞居住空間的補償性體驗。當超密度城市空間無法給予個體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商場舒心明亮的空間便以個體消費的自由來彌補。

四、結語：以想象力重塑城市空間

當香港的城市空間被全球資本“雙重壓縮”成高樓組成的圍牆，以及提倡消費以換取自由的商場，個人無論是出於自願還是被逼，生活方式是否只能順從資本的安排而沒有其他可能？

在《木偶之家》中，羅拉曾經遇見一個一直背靠著她的人，那人派給羅拉一張傳單，告訴她在這個只能夠買賣的地方，人不能夠掌握自己的未來，鼓勵她加入反抗的行列。⁹⁵ 羅拉後來遇見的少女則提醒她，這人是商場的反抗者，是異端，常說人在商場除了買賣，就沒有其他自由。⁹⁶ “羅拉”這個名字和小說篇名《木偶之家》，不禁令讀者聯想到易卜生（Henrik Ibsen）的名作《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玩偶之家》中的娜拉為了學會做一個自由的人，自行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她必須反抗自己的家庭，離家出走。按此推論，《木偶之家》的羅拉如果想由木偶變成真正的人類，同樣需要勇敢地反抗商場所象徵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雖然羅拉到了故事尾聲仍然未能尋得出路，但小說寫她不單沒有丟掉反抗者給她的傳單，還把傳單塞進褲袋中。⁹⁷ 這樣的舉動顯示她並打算放棄尋找離開商場的出路，依然保有反抗的力量，擺脫資本對她生活方

⁹⁴ 韓麗珠：《包裹》，《回家》（香港：香港文學館，2018年），頁155。

⁹⁵ 陳志華：《木偶之家》，《失蹤的象》，頁115—116。

⁹⁶ 同上，頁118—119。

⁹⁷ 同上，頁120。

式的操控。

若然商場的迷宮本無出路,或許出路只能通過想象才能創造出來。在《失去洞穴》中,當凡向賣藥的平原尋求可以舒緩憂慮和驚懼的藥方時,平原指示他挑選一個晴朗的日子,在陽光下讓村裏鐵網的影子橫在皮膚上,然後循鐵網在村內遊走一遍,再走到村外。面對這貌似荒誕的建議,凡懷疑地追問這種做法的效用。平原於是回答:“當務之急,就是設法讓自己相信,這世上並沒有任何事物,能把人真正圍困。”⁹⁸平原開出的藥方並非任何具體的草藥或藥丸,而是通過一種煥發想象力的活動,讓凡建立一種對自由的信念。在平原看來,如果任何物理形式上的圍困最終不能令人產生失去自由的心理效果,那麼人便不會失去真正的自由。然而,個人的感受始終難以徹底擺脫空間的影響,除了以想象力修練內心以外,還有其他方法嗎?

《假窗》通過木以想象力創造性地為密封的高樓繪畫假窗一事,指明了答案。失業的木接到建築師邀約,請他為沒有窗子的高樓以油彩繪上“假的窗子”。建築師向木道出超密度城市空間造成的圍牆效應:

窗外令人壓迫的景觀,例如鄰近大廈的外牆,回收場的鐵絲網,或鐵絲網內的棄置物,都比密不透風的牆壁更容易令人絕望甚至瘋狂。可是,沒有窗的房子也同樣令人難以忍受。⁹⁹

當超密度的城市空間無法容納真實的窗子,為了撫平居民住在密封空間所產生的焦慮和不安,喚醒冬眠動物那樣的微的生活的動力,叫那些工作至晚上才回到房子的人生出在新一天早上仍能走到外面的勇氣,建築師要求木在假窗內創造比現實更為逼真的風景,一種能讓人產生希望的風景。¹⁰⁰ 接受這份差事的木看著大廈空無一物的外牆,發現那其實是一片貧瘠的土壤,而這片土壤則需要一棵老榕樹。結果,油彩繪成的老榕樹為周遭的居民帶來難以言喻的安

⁹⁸ 韓麗珠:《假窗》,《失去洞穴》,頁84。

⁹⁹ 同上,頁140。

¹⁰⁰ 同上,頁140—141。

慰。至於室內的假窗，木則把它們建成“可以流放自己的出口”，那裏有一個又一個奇異的海底世界——漫步的潛水者、容貌古怪的大魚、海龜和珊瑚等。高樓竣工後，傳媒來採訪其中的住客，他們都表示被這些位於假窗內的景色深深吸引，更有人指出家中假窗的景色幫助他走過生命裏的艱難時期。以油彩繪上假窗的這棟高樓在城市裏取得空前的成功，甚至被傳媒認為“這將是人口密度愈來愈高的城市，住宅大廈的主要設計方向”。¹⁰¹

“當城市裏假的窗子蔚然成風，誰也沒有發現，在這風氣裏（在密封的牆壁裏）有轉醒過來的必要。”¹⁰²讀者也許會認為，城市裏的人迷醉在假窗提供的虛假風景，定然是小說對於城市人的諷刺，諷刺他們自欺欺人，以虛假的風景來舒緩被超密度城市間長期壓迫的心靈——這固然是一種可能的讀解。然而，本文認為小說意圖指出的是，通過對世界的仔細觀察，嘗試與環境產生感受上的深刻連結，人能夠借助想象力獲得了重新定義城市空間的力量。小說描寫木在開展繪畫的工作前，首先在工地裏觀察多時，讓自己融化在周遭的環境中，始發現自己應該把大廈外牆繪畫成一棵老榕樹。木以敏銳的心靈與周遭環境產生深刻的連結，細意感受當地居民的需要，以想象力為居民創造一個能夠撫慰他們心靈的空間。縱使木無法改變大廈無窗的現實，亦不能降低城市的密度，但憑著她的想象力，她成功為居民創造了一處抗衡圍牆效應的居所。木的成功，印證了建築師的判斷：“虛假和真實同樣由創造而來，它們都背著相同的根源。”¹⁰³

如果在圍牆和商場之內並無出路，我們便通過想象力去創造它。可洛在《守城人》把林守明設定為一位作家，他在一次意外裏穿越至自己正在創作的小說世界（小說內的城市同樣名叫“幻城”），與曾經是筆下的人物經歷了一場守護幻城舊區的社會運動，反抗政府把二十層區改建成支撐幻城繼續向天空發展的混凝土基柱。當活動陷入絕境，守護幻城舊區的運動陷入了兩條路線之爭的時候（即是在和平示威與勇武抗爭中二選其一，但兩條路線都不見得能

101 韓麗珠：《假窗》，《失去洞穴》，頁 143—145。

102 同上，頁 128。

103 同上，頁 141。

夠成功守護幻城舊區),林守明提出了應該走“第三條路線”的說法。饒有意味的是,林守明雖然覺得應該要走“第三條路線”,但實際上並不知道這條路線的具體含意。¹⁰⁴ 本文認為,“第三條路線”可以從小說世界中的先知對林守明的提醒見出:“那就寫下去,不要停,那怕是逐少逐少地寫。正如你寫出了幻城的現在,幻城的未來也就在你書寫的行動中。”¹⁰⁵書寫即行動。林守明既然是一位作家,那麼通過書寫啟動想象和創造,說不定他最終能夠為筆下的小說世界創造出“第三條路線”。通過持續不斷的書寫,通過永不放棄地去想象,現在看似牢不可破的現實,說不定在日後會有鬆動的可能。

林守明在《守城人》的尾聲回到現實世界。他打算重寫自己的小說,重新創造一個最好最理想的都市,讓他的小說人物生活在當中。這種以想象力重寫小說的行為,正正就是“第三條路線”的體現。值得注意的是,林守明意圖重新創造的幻城,是一個可以看見天空的城市,¹⁰⁶一個可以實現自由的城市。小說最後一段勾勒了這樣的畫面:“貨車駛到行車天橋下面,天空收窄成一條線,灰灰白白,顏色好似水泥,當中有一隻鳥喙度飛,似係搵緊出路。”¹⁰⁷水泥色的天空依然狹窄,林守明面對的現實依然由超密度的城市空間組成,但他決心要幫助筆下的人物想象一個更美好的城市。事實上,如果林守明能夠想象出一個美好的城市,或許他也能在現實生活中找到出路,仿如那隻天空上的鳥。畢竟,香港的圍牆再高,與幻城不同的是,天空仍在。

“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可洛、陳志華和韓麗珠筆下的“O城”、“鯨魚之城”、“幻城”、“H地”,無不展現出高樓和商場林立的城市景觀。¹⁰⁸ 屏風樓成為

104 當小說裏的人物追問林守明第三條路線具體來說是甚麼時,林守明回答他其實並不知道。可洛:《守城人》,《幻城》,頁218。

105 可洛:《守城人》,《幻城》,頁162。

106 同上,頁235。

107 同上,頁236。

108 本文集中論述三位“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闡述他們小說中的城市空間,藉此指出他們擁有共同的文學關懷。誠然,“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概念有助文學研究界聚焦於一批以往較少關注,生活和成長經驗相對接近的香港作家身上。然而,把“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視為一個創作群體的話,他們的作品在創作風格、文學觀念的取向上,有哪些重合和差異?隨著更新一代的青年作家湧現,“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意涵應該如何界定?這些都是本文未及探討,卻值得進一步思考、闡釋和發揮之處。

超密度城市空間的專屬符號，屢屢現身於小說內外，象徵了香港城市空間的過度發展和生活方式的單一。圍牆效應令城市人身心受損，困限了人對生活方式的想象力。對城市人而言，惟有大型空調商場的空間才能讓他們忘憂，以消費來重覓選擇的自由，即使這種自由僅是在不同品牌或商品之間選擇的自由。離開商場以後，城市人還是只能回到那個位於屏風樓內的居所，重回資本安排的生活秩序之中。

在可洛、陳志華和韓麗珠筆下的人物，絕大部分都無力影響資本對城市空間的塑造，只能承受。然而，承受不等於放棄。《木偶之家》的羅拉、《假窗》的木和《守城人》的林守明提醒讀者，只要不放棄書寫和想象，身為作家的他們依然可以通過旺盛的想象力和持續不斷的創作，為未來的香港/香港文學塑造出不一樣的真實/文字城市，從而打開日常生活/文學想象裏的嶄新空間。

（作者：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語文及通識教育學院 副教授）

引用書目

一、中文

(一) 專書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臺灣:聯經出版公司,2016年。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資本思維的瘋狂矛盾》。臺灣:聯經出版公司,2018年。

可洛:《幻城》。香港:立夏文創,2019年。

可洛:《她和他的盛夏》。香港:匯智出版公司,2006年。

可洛:《鯨魚之城》。香港:日閱堂出版社,2009年。

朱耀偉:《本土神話:全球化年代的論述生產》。臺灣: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

西西:《我城》。臺灣:洪範書店,1999年。

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2012年。

香港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月刊》。2000年1月。

張為平:《隱形邏輯:香港式建築極限》。香港:商務印書館,2015年。

許子東主編:《香港短篇小說選(1996—1997)》。香港:三聯書店,2000年。

陳志華:《失蹤的象》。香港:Kubrick,2008年。

陳智德:《根著我城:戰後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學》。臺灣:聯經出版公司,2019年。

黃宗儀:《上海酒吧:空間、消費與想象》。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鮑曼:《全球化:人類的後果》。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環保觸覺:《圍城:從屏風樓看香港的城市規劃》。香港:Warrior Book,2009年。

羅金義、鄭宇碩編:《留給梁振英的棋局:通析曾蔭權時代》。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3年。

薛求理:《城境——香港建築1946—2011》,香港:商務印書館,2015年。

韓麗珠:《失去洞穴》。臺灣:印刻文學,2015年。

韓麗珠:《回家》。香港:香港文學館,2018年。

韓麗珠:《縫身》。臺灣:聯合文學,2010年。

韓麗珠:《離心帶》。臺灣:印刻文學,2013年。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全球化:人類的後果》。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二）論文

葉韻翠：《批判地名學——國家與地方、族群的對話》，《地理學報》第 68 期，2013 年，頁 69—87。

劉紹銘：《香港文學無愛紀》，《信報財經新聞》第 24 版，2004 年 6 月 19 日。

黎海華：《陌生的異域——閱讀韓麗珠》，《城市文藝》第 63 期，2013 年，頁 82—84。

鄒文律：《重塑“我城”——從西西〈我城〉到可洛〈鯨魚之城〉》，《東海中文學報》第 36 期，2018 年，頁 31—68。

（三）網上資源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土供組報告》，《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網站，2018 年 2 月 28 日，網址：
<https://www.landforhongkong.hk/tc/views/index.php>

香港特別行政區勞工處：《香港主要行業》，《就業資訊網上平台》網站，2017 年，網址：<https://www.hee.gov.hk/heeip/tc/keyindustries>

香港旅遊業統計資料：《2018 年旅遊業表現》，《香港旅遊事務署》網站，2019 年 8 月 20 日，網址：https://www.tourism.gov.hk/tc_chi/statistics/statistics_perform.html

入境事務處：《2018 年 12 月訪港旅客統計》，《HKTB Research》網站，2019 年 1 月，網址：https://partnernet.hktb.com/filemanager/intranet/pm/VisitorArrivalStatistics/ViS_Stat_C/ViS_C_2018/Tourism%20Statistics%2012%202018_R1.pdf

二、外文

（一）專書

Edward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Limited, 1976.

Stefan Al, *Mall City — Hong Kong's Dreamworlds of Consump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Williams R.,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Yi F. T.,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U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二）論文

Daniel Staib, Dr. Maheash H Puttaiah, Olga Tschekassin, “World insurance: the great pivot east continues”, *Swiss Re Institute sigma* No. 3 (2019), pp.1–45.

S.H.L. Yim, J.C.H. Fung, A.K.H. Lau, S.C. Ko., “Air ventilation impacts of the ‘wall effect’ resulting from the alignment of high-rise buildings,” *Atmosphere environment*, 43 (Dec.2009), pp.4982–4994.

Skyscrapers and Shopping Malls : Writing the Hyper Density City by Ho Lok, Chan Chi-wa, and Hon Lai-chu

CHAU Man Lut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Language,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Abstract

Ever since Xixi's *My City* was published in 1975, literary works inspired by the topic of "Hong Kong City Space" have gradually increased. Most of these are written by post-1997 young Hong Kong novelists. Despite their diverse and creative writing styles, these novelists share a common theme in their writings, i.e., the city space in Hong Kong. Based on the hyper density cities described in *O City* by Chan Chi-wa, *Phantomcity* by Ho Lok, and *Area H* by Hon Lai-chu, this article aims to elucid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Kong city spaces and how they have been shaped by capital-driven hyper density and mall-like space application. It also discusses how the novelists' melancholy feelings towards the city of post-1997 Hong Kong are manifested in their writings and how they use their imaginations to reshape the city space of Hong Kong.

Keywords: Post-1997 Hong Kong young writers city space, Hong Kong fiction, skyscrapers, shopping malls